

叩问生命的神性

俄罗斯文学启示录

徐葆耕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叩问生命的神性

俄罗斯文学启示录

2005·精粹俄罗斯文学作品
400+ 600+ 70+ 250+ 在中国

徐葆耕著

徐 葆 耕 著

徐 葆 耕 著

徐 葆 耕 著

徐 葆 耕 著

徐 葆 耕 著

徐 葆 耕 著

徐 葆 耕 著

徐 葆 耕 著

徐 葆 耕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叩问生命的神性:俄罗斯文学启示录/徐葆耕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 - 7 - 5633 - 7964 - 4

I . 叩… II . 徐… III . 文学史—俄罗斯 IV . I512.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909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395790 - 103/168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上海市杨浦区嫩江路 199 号 邮政编码:200438)

开本: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10.5 字数:192 千字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俄罗斯的作家，双脚深陷在泥土里，头脑却飘浮在云端。他们提供给人类的不是明晰的思想，只是一片烟雨霏霏的迷雾。然而，正是在这片迷雾之中，人类的灵魂才得以舒展。因为灵魂的本质是迷茫的。这种迷茫不是沮丧或绝望，相反，它是对人的神性觉解，是对生命、眼泪和爱情的诗意图悟。

在俄罗斯文学里，穷人比富人更接近神；女人比男人更接近神；罪者比贤者更接近神；乡村比城市更接近神；泥土比蓝天更接近神；秋天比春天更接近神。

——手记

目录

序：我曾仰窥到天堂的闪光/1

寒夜，有人敲门……——他很漂亮：一种受难的美——爱情；两个人的宗教——忏悔：诚实带来快乐——宽容；没有罪人，只有不幸的人——神性的存在和俄罗斯神性——圣彼得堡的白夜

童年：圣母于蛮荒中降临/25

第一讲 嗜血的斯拉夫人怎样懂得了忧伤/25

古代罗斯：嗜血的民族英雄主义——《伊戈尔远征记》：跳跃在幻想树枝上的夜莺——雅斯拉夫娜的忧伤——神性俄罗斯的诞生——懂得忧伤是民族成熟的标记

少年：俄罗斯有了初恋情人/39

第二讲 普希金：恋爱的少年/43

什么是少年——爱上了美丽的胴体——爱情的折磨是十分迷人的——爱上了大海和人民——爱上了“恶”与忧伤——爱上了静谧而安详的自然——欢沐爱泉，欢沐灵泉，欢沐忘泉

第三讲 《叶甫盖尼·奥涅金》：城市对乡村的忏悔 / 77

城市贵族教育教你学会“做作”——寻找未被污染的自然生活——乡村：自然的和不自然的——重逢：无法走进真实的感伤

第四讲 普希金：50 年代中国的一个注释 / 99

青年：在幻想中烧成灰烬的“别”与“车” / 111

第五讲 23 岁的幻想——别林斯基及其现代意义 / 112

23 岁震撼了整个俄罗斯——没有神圣信仰的批评家一钱不值——真理受到侮辱是不能够容忍的

第六讲 乌托邦的必要——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怎么办》 / 129

奇特的爱情表白——《怎么办》：未来社会与婚姻的三原则——乌托邦与当代现实

中年：“罪感”是一种神性 / 145

第七讲 托尔斯泰：“蝎子式追问”的一生 / 148

忘不了那寒冷的早晨——对于“有钱”的追问——罪感导致“伯爵”离家出走——罪感是一种深刻的思想——为了快乐，必须忘却罪恶

第八讲 从“末日审判”到“创世”——论《战争与和平》的潜叙事 / 167

显叙事：历史的无意识合力——潜叙事：亚当、夏娃和蛇——“创世”与“末日审判”：两种相通的叙事模式

第九讲 从瞬间发现永恒——关于《安娜·卡列尼娜》 / 183

《安娜·卡列尼娜》引发的争论——安娜与潘金莲——对《安娜·卡列尼娜》中几个细节的分析——托尔斯泰认为对人的分析应以瞬间为单位——托尔斯泰对小说叙事的革新

第十讲 灵魂被锁着,可钥匙丢了——契诃夫的当代性/203

作品中最常出现的字眼是“灵魂”——灵魂之间的“虚假关系”——爱 = 一个幻觉——庸俗;网状的权力结构——灵魂的本名叫“忧伤”

暮年:十字架下的现代主义/229

第十一讲 月色幽微——白银时代的阅读笔记/229

一段难堪的往事——索罗维约夫和“永恒的女性”——梅、吉夫妇和“第三约言”——阿赫玛托娃;她的脸因痛苦而变得年轻——别尔嘉耶夫和宗教自由主义——茨维塔耶娃;十字架的另一面

第十二讲 抓火者——重读勃洛克和《十二个》/264

天堂的玫瑰——玫瑰和蚂蚁王——心灵世界的三角形结构——“末日审判”的阅读快感——焚烧自我的神圣激情

再生:太阳依然是灰色的/287

第十三讲 粗鄙的闯入者——来自底层的文学与肖洛霍夫/288

粗鄙的闯入者及其意义——顿河;鱼和寒泉的隐喻——关于土地与茅屋的神话

第十四讲 保尔:新圣徒的理念和激情/304

第十五讲 烟雨霏霏的黎明——“自然神”的治疗意义/315

后记/325

序：我曾仰窥到天堂的闪光

在那美妙的一瞬，
我眼前出现了你：
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
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

——普希金：《致 K. H.》

寒夜，有人敲门……——他很漂亮：一种受难的美——爱情；两个人的宗教——忏悔：诚实带来快乐——宽容：没有罪人，只有不幸的人——神性的存在和俄罗斯神性——圣彼得堡的白夜

寒夜，有人敲门……

寒冬的一个晚上，我蜷缩在沙发上，百无聊赖地听任电视屏幕上《小李飞刀》撞入眼帘，令人神炫目迷的武打场面催我进入梦乡。

有人敲门。

打开门。站着一位身材矮小的年轻人，一副阔大的眼镜闪着捉摸不定的光亮。

“您是徐老师吧？我是北大的研究生。送一份我们编的杂志，请您指教。”

他走了。连名字我也没问。

这显然是一份非正式的出版物，封面上没有时髦的艳丽色彩，只是在很普通的白纸上印了《我们》两个字和鲁迅的木刻像。主办者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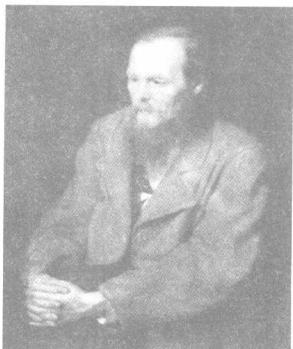


图1 陀斯妥耶夫斯基像

“百年同行协会”。我每个月都要收到若干寄赠的刊物，日积月累，无处存放，只好丢弃。这份简陋到无以复加的小册子，我保留至今。

卷首引用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话：“我们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我们不能用别的方式去爱，也不知道有其他方式的爱。”

刊物中，大部分篇目是讨论俄罗斯文学与哲学的。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位叫林国华的研究生的硕士论文：《论陀斯妥耶夫斯基思想中的末世论问题——关于文学与宗教关系的个案研究》。文中引用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一段描述：

俄国的小伙子……聚集在这里的脏酒店里，坐在一个角落上。他们以前从不相识，一出酒店，又会几十年不相见，但那有什么？碰到酒店里相会的机会时，你看他们在讨论什么？讨论的不是别的，而是宇宙的问题：有没有上帝？有没有灵魂不死？而那些不信上帝的，就讲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和怎样按照新方式改造人类等等；结果还是一码事，是同一问题的两面。今天我们有许多极不寻常的俄国小伙子都在讨论永恒的问题。（图1）

我的睡意顿无。我想到,就在我百无聊赖地在电视机前消磨时光时,离我不远的北大校园里,在一间比“脏酒店”好不了多少的低矮房间中,一批“百年同行者”在讨论“永恒”的问题。一定是的。否则,就不会有我手中这本《我们》的诞生。

俄罗斯的神性不是源于教堂,不是源于神父,不是源于那些修养有素的贵族学者;它深藏于底层的“脏酒店”,深藏于乡村的茅屋,深藏于那黑油油的俄罗斯土地。

思想的柳絮飘忽着,往日的许多埋葬了的记忆,从深不可测的心灵湖水中浮现,由模糊逐渐变得清晰,悲怆的潮水渐渐地淹没了我的灵魂……

他很漂亮:一种受难的美

上个世纪的 50 年代,是一个“脱榫”的年代。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民族:我们关心的是衣食饱暖、家庭和睦、国泰民安、天下大同;我们做人、行事的标准,也是以地上的、现实的利益为中心,很少有人把天上的、“彼岸”的理想当作一件严肃的、必须思考的事。50 年代的中国脱出了这个轨道,原因是,天空升起了一轮新的太阳,即“共产主义”。这个“天国”虽然也是人构建的,但是,那时候的年轻人,却把它视作明天早晨就会普照大地的现实。因此,他们很早就自命为这个天国的人,把“解放全人类”当作生命的最高意义和行动指南,生活上则像一个清教徒:在食堪果腹、衣仅保暖的情况下,很少有人愿意花费时间去思虑改善自己的衣食住行;属于人的正常的人伦关系和情感享乐,无论爱情、亲情还是友情,只有在同这个高尚的理想重合的时候才会被人们珍视。他们爱了,不仅享受花前月下的拥吻,而且希望“沿着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相反,如果美丽的爱情同社会的天国事业有所悖谬,就会被人们割

舍。这种割舍的过程被视为是一种高尚的、神圣的痛苦。享受这种痛苦可以获得一种道德上的自豪和愉悦。他们都是无神论者，不信宗教，但是，却无条件地崇拜地上的神，相信奇迹，渴望传奇，觉得周围的空气都是洁净而清新的，路边的小草带着天国的露珠，孩子的脸上洋溢着天使般的微笑。那时候，社会上小偷之少、欺诈之少、妓女之少、吸毒之少，都同这种天国想象相互辉映，让人产生一种幻觉，觉得天堂的曙光已经在遥远的天边出现。这个时期的英雄人物，大多带有圣徒的受难和牺牲的气质，虽然他们附丽的事业带有某种空幻性，甚至荒诞性，但是，这终究是一场为广大穷人的翻身解放而献身的神圣行为，令我们不敢嘲笑和亵渎。

同这种神圣理想追求相适应的文学，首先就是前苏联文学。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第一次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带来的震撼。它给予我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那一年我只有 14 岁。志愿军文工团对我进行了技艺考试之后问的唯一的问题就是：“怕不怕死？”这是一个最令那个年代的少年激动不已的问题：渴望变成英雄，渴望壮烈的死亡，渴望在战火硝烟中把自己变成一张众人瞻仰的带黑框的大照片，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奇特的理想与激情。当我真的被志愿军文工团录取并且被告知，在安东（今丹东）受训两星期后就赴朝参战的时候，我心里升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走上了保尔的道路！”这件事由于家里的坚决反对未能实现，令我极其懊恼，感到这是自己人生道路的第一个挫折。当时，如果真的上了前线，也许会成为光荣的烈士；但更大的可能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转业当一名行政干部，因为我并没有什么出奇的文艺表演才能，在表演团体里只能当个小职员。今天看来，这件事真是极其幼稚可笑的。但是，那种渴望在正义的事业中献出生命的激情中包含着某种纯洁而动人的因素。当我看到今天，人们由于格外珍视生活的享受，而在需要有人牺牲的时候，无人挺身而出时，我就常常想起

那个时代人们的心态，觉得我们在新的生活理想阶梯上攀登的时候，似乎丢失了什么。

人们常常习惯于把前苏联文学同俄罗斯文学区分开来，认为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和美学选择。其实，在这两种文学的深层有一条牢固的纽带把它们连在一起，这就是一种“殉道者”的气质。俄罗斯文学区别于其他西方国家文学的最重要的特质也在于此。在惊人的贫困、愚昧和野蛮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俄罗斯文学，由于它的东正教传统和欧洲启蒙理想相结合，显示出一种救世主义的深厚情结。这种救世主义又同自我拯救密不可分。19世纪的俄罗斯作家大多对东正教的教会持批判态度，但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崇拜耶稣、圣母玛利亚和圣女索菲亚。在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下，震惊于自己祖国的贫穷和愚昧的俄罗斯作家，大多具有强烈的破坏欲和创造欲，在守法的平民和罪犯之间，他们本能地选择罪犯。许多人脱离自己的贵族立场和生活，而同贫苦的人民一起受难。“受难与爱”，成为他们的最高意义的人生追求。

中学时代的我，还不能够从更深刻的层面上理解俄罗斯文学。首先把我震撼了的是那些作家把受难当作快乐的奇特选择：被尊为“俄罗斯文学之父”的普希金出身于贵族，但在贵族学校上学时就把以推翻沙皇统治为志向的十二月党人引为知己，这使得他几乎整个人生在流放和软禁中度过，包括他在决斗中死亡，都令人感到是一场蓄意谋杀。但我无法认为他的一生很痛苦，很不幸，恰恰是苦难给他带来颠覆一个旧世界的满足，他坚信，“迷人的幸福的星辰就要升起”、“我不会死亡……在这残酷的世纪我歌颂自由，并且为倒下去的人们祈求过怜悯和同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出身不是贵族，但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的身份足以令他在社会上有一份优雅的生活，但是，正像人们所知道的，他从23岁起就被流放，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流放地写成的。一般而言，一个人处在被监禁或流放的非

人的生活条件下,能够坚强不屈已非易事,而他居然还能够创作,并且写出洋溢着乐观的理想主义精神的作品,这不是凡人可以达到的境界。列夫·托尔斯泰是位地地道道的“伯爵”,拥有自己的庄园,但是,他生活中最大的苦恼恰恰来自于“伯爵”的受人尊敬的地位和生活环境,在 82 岁高龄由于不堪痛苦,竟然选择离家出走,想去过平民的生活,结果客死在一个小火车站上。还有一位给我影响至深的诗人,就是那位莫斯科大学校长的女婿、无论从身体形象还是气质上都出类拔萃的勃洛克:在明知十月革命将要给他的阶级带来毁灭的时候,毅然投身进去,就像纵身投入烈火的殉道者。他们的“道”直接通往“末日审判”和“创世”。他们的“审判”目标不仅指向专制愚昧残酷的沙皇社会制度,而且指向他们自己。他们渴望创造的“新世界”不仅来源于上帝的天国、西欧的启蒙理想,而且带有拯救一切受苦人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所有这些超越世俗的理想和生命冲动同苏维埃政权的创造者保尔·柯察金、恰巴耶夫、卓娅,构成上下传承的血脉联系;在这些社会理想迥然不同的英雄人物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身影,那就是耶稣。勃洛克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的著名长诗《十二个》中,耶稣和他的门徒同革命的红军走在一起。

一个正常的少年,内心总是涌动着太强的破坏欲。孩子们对于“恶”,与其说是痛恨,不如说是好奇。童话中的杀人魔王虽然可怕,但并不可恨。许多孩子都梦想自己也能够成为一个威风凛凛的魔王。俄罗斯作家对于“恶”有一种本能的、“隐遁的”热情,这是我在少年时代就迷上俄罗斯文学的重要原因之一。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从一个年轻的贵族军官格里涅夫的视角,写恶魔般气质的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表面看来,格里涅夫处处注意保持贵族的立场,甚至在被俘后也拒绝同普加乔夫握手,但是,字里行间却掩饰不住对这个杀人如麻的不识字的农民的喜爱:他宽厚、朴实、善解人意,甚至在被轻蔑的情况下依然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地慈祥。托尔斯泰在写

作《安娜·卡列尼娜》之初,是要把她写成一个“犯了罪但罪过不很重”的作风轻浮的女人,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几乎身不由己地把安娜写成了世界画廊上最为光彩照人的女性之一。这种对于“罪犯”的“隐遁”的喜爱构成了俄罗斯文学作品的独特的魅力。

俄罗斯作家对于“恶”的这种激情,又使得他们意识到人的局限性,意识到由于人的自身的“恶”而难以接近天国理想的悲哀。这是俄罗斯文学最迷人之处,也是令其他许多国家的文学只能望洋兴叹的一个神性境界。

别尔嘉耶夫在他的《思想自传》中谈到“俄罗斯式的忧伤”时说:

忧郁指向最高的世界,并伴随有地上世界的毫无价值、空虚、腐朽的感觉。忧郁面向超验的世界,但同时它又意味着不能和超验世界汇合,意味着在我和超验世界之间存在着鸿沟,为超验世界而忧郁,为与地上世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而忧郁,为超越地上世界的限制而忧郁。它也影响到在超验世界面前的孤独。^①

这种孤独、感伤和迷惘造成俄罗斯文学有一种迷雾般的情调。伍尔芙谈到俄罗斯文学的特征时说:

单纯朴素的风格、流畅自如的文笔,假定在一个充满不幸的世界中对我们主要的呼吁就是要我们去理解我们受苦受难的同胞,而且“不要用头脑来同情——因为这还容易做到——而是要出自内心”——这就是笼罩在整个俄国文学

^①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雷永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之上的那片云雾，它的魅力吸引着我们，使我们离开自己黯然失色的处境和枯焦灼热的道路，到那片云雾中去舒展……^①

在为一个崇高的理想或者幻觉义无反顾地献身的同时，又意识到由于人自身的局限（有罪），而产生一种迷雾般的惘然和“秋天式的感伤”，这就是俄罗斯文学。

人是一种追求快乐的动物。凭借自己的劳动换取一份快乐的生活，无可厚非。但是，俄罗斯文学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他们的最高追求是“受难与爱”。前一种生活可以叫做“人的正常生活”，后一种则是“人的神性生活”。就在前一种生活被普遍接受的同时，后一种生活正在从我们的精神世界中被删除。

白银时代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在谈到她的丈夫谢·艾德隆（后被苏维埃政权枪决）时说：“他很漂亮：一种受难的美。”

同样，我想说：“俄罗斯文学很漂亮：一种受难的美。”

爱情：两个人的宗教

作为少年，哪怕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最富于吸引力的也是对于异性的朦胧的爱情。在我的幻觉中，一个明亮而又模糊的形象总是飞来飞去，就像燕子在晨曦中的花丛上头啁啾一样，我不明白我渴望的是什么；在沉思、惆怅和悲伤中，青春和蓬勃的生命冲动像春天的绿草一样日益繁茂。那时候，屠格涅夫的《初恋》是许多人想读、又怯于读的书，因为我们羞于启齿谈论初恋的神秘感受。当我读到那四个年轻男孩子跪倒在公爵小姐齐娜依达裙裾之下的段落时，我也渴望

^① 伍尔芙：《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页。

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去吻那双令人心醉神迷的脚，享受女孩的玉手执花敲击我的前额的快乐。这种感觉令我头晕目眩。

不久，敲击我的前额的美少女终于出现了。那是一个凉风习习的夜晚，当她身穿《荷花舞》的白色舞裙从角落里飘然而出的时候，我的整个灵魂完全被融化了。我不记得那天自己是怎样走回家的，在一盏盏午夜街灯照耀的长长的影子伴随下，我反复地念叨着：“在那美妙的瞬间，我眼前出现了你：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仿佛只有这首普希金的诗可以表达我的难以言状的激动，甚至就在我们的恋情结束以后的很长的岁月里，只要一听到这首诗谱成的歌曲，我依然激动不已。我常想，少年时代的爱情其实就是一首诗，一种美的幻觉。

当我到了白发苍苍的年纪，向自己的学生讲起我的初恋时，他们往往会提出一个疑问：在他们看来，五六十年代是一个思想僵化、情感枯索、行为残酷的年代，在贫瘠的土地上怎么会开放出美丽的爱情的花朵呢？在已经很开放的今天，初中学生的恋爱也会受到干预，五十年前怎么没有受到粗暴的摧残呢？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来回答：那时候有一本被学生奉为做人的经典的书，叫《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女英雄卓娅是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光荣牺牲的战士，她在洁白的雪地上赤着纤足走上绞刑架的形象使她被尊称为“真理姑娘”。然而就是这本书里，女英雄的母亲怀着深情记述了卓娅在中学时和他的男友之间的爱情故事。“卓娅在中学就是有男朋友的”，只要这一点就足够回答一切对于中学生谈恋爱的非难。当有人举报我在谈恋爱时，少先队的总辅导员找我做了一次严肃的谈话：不是要求我结束这种关系，而是鼓励我“像卓娅那样处理好同学学习、事业的关系”。只有我的母亲忧心忡忡：“但愿别发生什么事。”她所担忧的“事”，是很少发生的：那个年月的少男少女，即使在最亲密的时候也仅限于拉手和羞涩地拥抱。只有到了大学一年级，我们

才认为有接吻的权利。至于我母亲所担心的“事”，我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也曾想象过，但一旦见了面，就如同见了女神，这种念头就隐遁到“爪哇国”里去了。

那是一个把爱情视同神圣的年代，特别是把自己钟爱的女友视同神的时代。这种观念发端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如但丁的《神曲》），但却在俄罗斯文学中获得丰富的展开。记得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几乎每天下学后都跑到王府井的三联书店，坐在地上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逐一读完：《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烟》、《父与子》和《处女地》，还有《阿霞》、《春潮》。屠格涅夫的小说和散文，在俄罗斯作家中独树一帜。他的大部分作品像是一条阳光下潺潺流过的小溪，清澈见底，轻快活泼，但是，它们终将流入大海，被命运所吞没，因此，又有一种惘然的轻雾如烟一般笼罩在深陷于爱情的男女的头顶上。小说中的青年女性特别令我神往：在寒冷的清晨伫立街头等待罗亭、准备和他私奔的娜塔里亚（《罗亭》）；带着对拉夫列斯基的深挚的爱走进修道院的丽尼（《贵族之家》）；跟着革命者的丈夫走向战场的叶连娜（《前夜》）……她们不仅美丽，而且在精神品格上高于男性，她们事实上是圣母玛利亚或者是圣女索菲亚。同样使我心仪的女性还有在月光下写作情书、袒露心曲、毫无做作的达吉亚娜（《叶甫盖尼·奥涅金》）以及志向远大、开创新生活模式的薇拉（《怎么办》），虽身为妓女，却心灵崇高、拯救世人灵魂的索尼亚（《罪与罚》）等等。普希金时代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大多出身贵族，有着优裕的生活条件，但起义失败后，她们义无反顾地追随丈夫走到荒凉的西伯利亚去服刑。她们是那个时代爱情的神圣性的象征，是我们少年时代心向往之的形象。所有这些女性和她们的爱情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带有某种神圣的宗教意味。爱情决不仅是欲望的满足或建构小家庭的途径，而是一种信仰和奉献，是两个人的宗教：一旦爱了，就意味着把自己的全部无保留地奉献给对方，就像奉献给神